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历史见证

□ 宋建忠

南海东连太平洋，西接印度洋，周边被大陆和岛屿环绕，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水深1212米。南海海底地形从周边向中央逐级下降，由外向内依次发育着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和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其中的大陆坡上，水深约1500米，处在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重大发现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考古探明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完成了遗址三维激光扫描和核心堆积区的摄影拼接，采集了海底沉积物及底部水样，提取出水文物标本约600件（套）。

一号沉船遗址时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底部船体和巨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长约37米、宽约11米，数量不少于10万件。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包括青花、青釉、青白釉、白釉、红绿彩、黄釉、珐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造型精美、色彩斑斓的珐华器，包括珐梅瓶和珐华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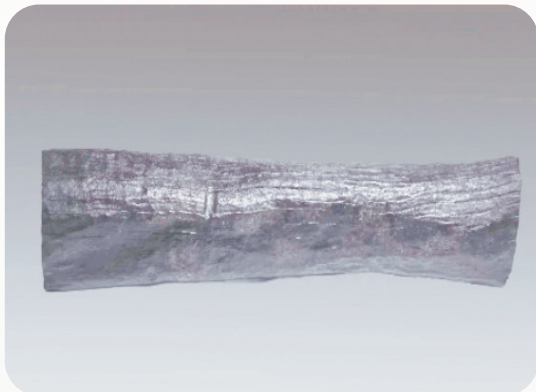
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时代约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为大量码放整齐的原木，表层可见数量600多根。原木皆呈黑色，经初加工截成一定长度，短者约0.6米，长者近2.5米左右，直径9至28厘米不等，质地坚硬，保存状况较好。采集样品经中国林科院木材研究所检测为柿属乌木，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地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等热带区域。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独特区域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海上重要通道，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海上通道。依据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为了“以利越之犀角、象齿、



一号沉船
出水珐华彩莲纹梅瓶



二号沉船遗址出水乌木

翡翠、珠玑”，不惜发动数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就是为了南越地区从海外获取这些奇珍异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派遣使臣前往海外，积极开辟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出发的航线，最终可达印度洋之“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说明当时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联结起来的海上航线已初步形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自此以后，无论是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还是明朝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乃至明清时期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针经，应该说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徐闻、合浦道”航路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两千多年来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的双向交流，谱写了不同文明跨越山海

的交流互鉴。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日趋繁荣。国内外考古发现这一时期较多的沉船就是证据，如泉州后渚沉船、南海1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印尼印坦沉船等。明清时期，官方虽长期实施海禁，但民间走私贸易却屡禁不止，考古发现明清时期的沉船就多与民间贸易有关。从以往考古发现沉船所处海域看，无论是印坦沉船、新安沉船，还是南海1号、南澳一号等沉船均沉没在近岸浅海区域，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岸航线范围内，从未在离岸航行的深远海域发现古代沉船，直到这次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二号沉船的发现。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明弘治—正德），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出水文物来看，一号沉船发现成批量的珐华器，这在沉船中是首次发现，对研究珐华器之外销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珐华，又称“珐花”“法花”“法华”，是一种以陶或瓷土为胎，施蓝、绿、白、紫等各色中温釉，采用沥粉之法勾勒纹样轮廓，二次烧成的器物。民国时，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中记载：“法花之品，萌芽于元，盛行于明。……蓝如深色宝石之蓝，紫如深紫色晶之紫，黄如透亮之金珀；其花以生物花草为多。”明中期，景德镇地区开始使用瓷胎仿制珐华。一号沉船所见珐华器即为景德镇所产瓷胎珐华，器型为蓝、绿、紫梅瓶和大罐，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考古发现的珐华器历来罕见，沉船发现更是前所未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藏珐华器又多为传世。因此，一号沉船集中发现一批如此炫目多彩的珐华，说明珐华器在明代中期已成为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乃至中东地区国家所喜爱的商品。

从发现区域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是首次在南海深远海区域发现的古

代离岸航行沉船，所处位置基本在《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所记载的古代航线附近。一般认为《郑和航海图》形成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年）之间，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顺风相送》形成于明代末期；《指南正法》则形成于清代早期。一号、二号沉船属明代中期，处于《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之间，表明其遵循的航线应该就是《郑和航海图》所载航线。因此，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而且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

从航行目的地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是首次同时发现出航与返航的古代沉船。以往考古发现沉船均为驶向国外的出航商船，尚未发现返航中国的商船。这次发现的一号沉船满载以景德镇外销瓷器为主的船货，无疑是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中国商船；二号沉船所载船货以印度洋地区所产乌木为主，基本可以确定是从东南亚返回中国的商船。这一进一出的两艘沉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历史见证。

从人类海洋文明史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时代正处于郑和下西洋之后、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初期。弘治、正德两朝（1488—1521年）合计34年，恰处15、16世纪之交，这时距离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已过去六七十年，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因此，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不仅展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塑造力和持续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并非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一枝独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海贸易航线，也在为世界逐步连为一个整体贡献力量，丰富了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考古项目负责人）



相关市场化机制，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快将环保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推进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深化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循环改造。加快绿色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完善循环经济体系和低碳能源改造，推动产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推进科技、教育、市场准入和监管等领域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激励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一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动机”作用。一方面，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首台套应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制定民营经济促

（上接1版二条）

坚持纠树并举促进常态长效。将作风建设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严查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推动风腐同查同治，让广大党员干部习惯于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以治促建，加强深层次源头性问题的研究，推动职能部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协同高效推进制度建设。坚持纠树并举，引导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涵养抓落实作风，立足职责推动移风易俗，带动社会风气持续向善向好。

一严到底锲而不舍加强纪律建设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既要把规章制度立起来，做到有规可依、有矩可循；又要确保制度执行到位，做到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强化纪律教育。抓好党纪学习教育，聚焦党章这一党的根本大法，以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重要内容，推动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持经常性纪律教育和集中性纪律教育相结合，探索开展沉浸式、互动式、帮带式教育，推动形成学习纪律浓厚氛围。加大对年轻干部、新任担任干部的纪律培训、廉政提醒力度，着力解决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真正把遵规守纪印在心、践于行。

严格纪律执行。准确把握政策界限，统筹运用党性教育、政策感召、纪法威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做到纪法情理贯通融合，切实维护纪律刚性。加强对运用“四种形态”情况的动态分析和监督检查，及时发布典型案例，推动精准定性量纪执法，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综合考虑事实证据、思想态度、纪法标准，进一步明确容错纠错、澄清正名的情形、幅度和程序，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凝聚执纪合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督促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遵守纪律、严格执行纪律，做到敢管敢治、严管严治、长管长治。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同向发力，健全

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坚持精准问责、规范问责，建立重点领域问责提级审核、问责案件专项评查制度，防止和纠正问责不力、问责泛化等问题。

一鼓作气久久为功铲除腐败土壤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当前，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篙松劲退千寻，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下大力气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切实提高腐败治理效能。

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确保“后墙”不松动。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坚决防止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消除风险隐患。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严厉打击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加大对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治理力度，强化对行贿、介绍行贿、洗钱等腐败关联犯罪的全链条惩治。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常态化机制化。

努力完善零漏洞制度，确保“底板”再加固。深化以案促改，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单位治理、部门治理，促进行业治理、社会治理，形成叠加效应与综合效能。深化审批监管、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推动职能部门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减少设租寻租机会。加快推动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深入开展零死角教育，确保“初心”不变色。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用好案情通报、忏悔录等反面教材，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深化处分决定宣布工作，对每一起案件都要宣布处分决定，督促案发单位以案说纪、说法、说德、说害、说责，把处分决定“一张纸”变成警示教育“一堂课”。实施“廉洁文化启智润心工程”，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形成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确保党员干部“初心”不变色、“信念”不蒙尘，推动党的基业长青、人民的事业向好。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上接1版头条）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个别西方国家对我们的遏制、围堵、打压，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切实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确保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优势，着力推动体制创新，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大力推动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经济发展向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动力。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从根本上讲，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都来源于科技创新。一是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顺应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和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研究前移的新趋势，优化完善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持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原创水平。二是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适应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发展阶段转变要求，着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三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基石。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是核心，人才是先导和关键。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家、企业家、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四是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包括强大的科学基础、高素质的人才、比较发达的科技金融、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等，让新质生产力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为参天大树。

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加快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一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二是积极

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一批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要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打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在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三是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迫切需要。一是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太阳能、风能，加速推动氢能、核聚变等先进能源技术革命性、颠覆性突破，加快新型储能技术发展，推动引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二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大环保装备技术创新，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

进法，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大力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二是推动科技、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添油助力”。提高基础研究稳定性持续性支持经费的比例，深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薪酬制度、评价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鼓励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融资模式和特点要求，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三是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发挥政府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促进作用。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加快完善数据基础性制度。加强人工智能、干细胞和基因治疗等领域安全法规建设。完善创新药价格形成和费用分担机制，激励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建立健全低空空域管理制度。

坚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新质生产力区域发展格局。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和重要支撑。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

坚持分类指导，加强规划引导和布局，促进各地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一是发挥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经济大省发挥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产业发展，加快经济新发展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向高质量发展全面转型。二是促进区域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加大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的支持，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集聚，完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极。要围绕构建优势互补、特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三是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加大科技创新条件和平台建设，支持这些地区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数据流动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力关系，努力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源地和排头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